

农村赊欠及其市场、关系、文化嵌入性

——基于安徽ZX镇绿园商店的个案解剖

耿言虎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赊欠交易在农村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借鉴“嵌入性”理论, 从社会学视角以“总体社会事实”的方法对安徽ZX镇绿园商店赊欠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 农村赊欠紧密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化之中。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市场转型诱使赊欠由“支配型”向“共谋型”转变; 人际信任、信任差序格局和信誉再生产是赊欠运行的现实逻辑; “去耻辱感”、赊欠“善举”和象征资本的赊欠文化是赊欠成风的人文背景。赊欠在农村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 需要淡化其“问题”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 农村赊欠; 嵌入性; 经济场域; 关系嵌入; 赊欠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4)02-0020-08

Rural credit and its embeddedness in mark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n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Luyuan store in ZX town, Anhui province

GENG Yan-hu

(Sociology Depart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Rural cred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rural society. Referring the theory of embeddedness, using the method of “total social fact”, this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rural credit at Luyuan store, ZX town, Anhui province. The analyses results show that credit is closely embedded in the rural market,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credit culture. The transition from seller's market to the buyer's market made credit change from “controlling type” to “conspiracy type”; Interpersonal trust,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and trust and credit reproduction are the realistic logic of credit operation; The credit culture of “de-sense of shame”, credit “goodness” and symbol capital ar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credit. Since credit in rural areas h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often its character of “problem”.

Key words: rural credit; embeddedness; economic field; relation embeddedness; credit culture

一、被漠视的农村赊欠

赊欠在我国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 最早见诸于文献的关于“赊”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周礼》。此后, 对赊的历史记载从未间断。民国时期,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兴起, 人们对农村赊欠有了概况性的认识。当代农村经济史专家李金铮通过整理数据资料发现, 民国时期赊欠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30年代期, 江苏

常熟县, 农民赊借者占 2/3, 句容县占 60%……又据江西、安徽、湖北部分农家的调查, 从商店赊借的农民分别占总户数的 42%、37%、13%”^[1]。当代农村赊欠也非常普遍。人民日报 2002 年报道“在吉林省的农安、镇赉、磐石、永吉等县(市)的广大农村, 店铺赊销的情况普遍存在, 赊出的数额从七八千元到一万二三元不等, 平均在万元左右”^[2]。在笔者调查的安徽中部 ZX 集市, 部分肥料商店年赊卖金额达到几十万元之多, 并呈现出“全民皆赊”的景象。可见, 无论是历史上, 还是当代, 赊欠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频繁发生于我国农村地区。但令人费解的是, 面对如此盛行的农村赊欠现象,

收稿日期: 2014 - 02 - 20

作者简介: 耿言虎(1986—), 男, 安徽长丰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社会科学领域却鲜有研究。更为吊诡的是，学界对民间金融、乡村信贷等的研究却热度不减。笔者认为造成目前农村赊欠现象研究不足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学者将赊欠纳入了民间金融或乡村信贷的范畴，而忽略了赊欠这种经济现象自身的特殊性。信贷的两端都是“钱”，而赊欠的两端分别是“物”和“钱”，作为贷款的“钱”和作为商品的“物”背后蕴含的制约因素和行为逻辑的差异是明显的，并且这种差异性是由基层市场、关系网络和农村文化生产出的。此外，关注不足也与学界将“赊欠”更多地看作一个经济现象有关。赊欠是由于交易中的买方因短期支付能力不足，而发生的延期支付的交易。按照经济学观点，在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赊欠交易盛行反映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和问题，如农村正规金融服务滞后、农村经济分化加剧等。按此逻辑，进而得出减少赊欠的对策，如改善正规金融服务、缩小农村收入分化等。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农村赊欠现象与经济学视角有何不同？赊欠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逻辑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视角与资料来源

“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嵌入性”指的是经济情境中决策受社会、文化、政治和认知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嵌入性”理论认为行动者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3]。与经济学家的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同，社会学家更强调人的“社会性”，作为一个“社会人”必然受到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等多方因素的制约。波兰尼(Polanyi)、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Uzzi、Barber、Lee、Whiteman、Cooper、Zukin等诸多学者对“嵌入性”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波兰尼提出“嵌入”概念，认为“非嵌入”性的、或者不接受社会、或其他非经济权威治理的经济行动将是破坏性的。格

兰诺维特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概念，认为经济行动是为“嵌入在正在运行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系统中”，网络对于“嵌入”概念具有核心意义^[4]。Zukin和Dimaggio认为除了讨论“结构性嵌入”外，还应研究“政治的”、“文化的”和“认知的”嵌入^[5]。我国学者对“嵌入性”理论也进行了充分研究，并将“嵌入性”理论广泛应用于分析诸如合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笔者试图将一个“脱嵌化”的经济现象“农村赊欠”重新嵌入农村社会生活中，以期对它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绿园商店位于安徽省中部ZX镇的农村集市中，主要经营农资，包括化肥、磷肥和各类复合肥。绿园商店已经经营十余年，年营业额50万元左右。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08—2010年的多次田野调查，访谈对象包括绿园商店及商店的顾客群体。商店每年都有大量的赊欠现象发生，赊欠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赊欠的人次多。首先，赊欠顾客的人数多。商店的顾客群中至少50%以上的顾客都有过赊欠的经历；其次，赊欠次数频繁。尤其在一些与老顾客的交易中，重复赊欠次数非常多，赊欠以“赊欠—还款—赊欠”的循环方式延续；第二，赊欠的金额大。每年的欠款总金额占到当年商店的总营业额的一半左右。以商店50万元的年营业额计算，至少要赊欠20余万元。单笔赊欠和累计赊欠的金额也很大。有的顾客单笔赊欠达到数千元。在商店的欠款客户中，部分顾客累计赊欠金额达到6 000~7 000元；第三，“非匮乏缺赊欠”比例很高。“非匮乏缺赊欠”指非资金因素导致的赊欠。在商店的赊欠中，非匮乏缺赊欠占到50%以上。

ZX镇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一年两季，夏秋种植水稻，冬春小麦和油菜。主要的赊欠发生在水稻、小麦和油菜的播种期间。一般还款时间为农作物出售的时间段。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收入的增加，农历年底还款比重有一定程度上升。超过95%以上的欠款当年都可以回收(表1)。

表1 绿园商店赊欠、还款时段与还款比例

欠款时间段	还款时间段	还款事由	还款占欠款总额的比例
9月、10月	次年6月、7月	出售小麦、油菜收入	赊欠金额的60%左右
5月、6月	当年10月、11月	出售水稻收入	赊欠金额的60%左右
	1月、2月	打工收入	当年赊欠金额总和的30%
	零散的时间	其他收入	当年赊欠金额总和的5%~10%

三、市场转型与赊欠图景转换

市场可以看作是实体性的交易场所,也可以看作建构性的经济场域。布迪厄为反对原子论式的机械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提出了经济行为的场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发生于特定的经济场域中,行动者的影响力取决于各自拥有的“力量”,即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总和。经济场域是一个“斗争”场域,各种力量的角逐建构了经济场域,价格就是力量(权力)关系“斗争”而建构的产物^[6]。农村赊欠发生在农村市场的“场域”中,农村市场的权力结构是怎样影响赊欠的?买方和卖方是如何互动的?

就农村市场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即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化肥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国家总体生产能力有限,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化肥的生产、销售、定价管理都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色。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国家逐步放开生产、销售和定价权。化肥的销售经营管理经历了“三步走”的转型,即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完全计划;第二阶段:1988—2009年适当放开;第三阶段:2009年以后全面放开。^②

ZX镇肥料市场买方市场是以商店数量递增为外在表现形式的。1990年前镇里唯一的肥料经销商是ZX镇供销社,肥料短缺严重。1990年,ZX镇第1家私人肥料商店出现,标志着肥料向私人流通领域开放。1994年,肥料经营商店就达到9家,供需矛盾大为缓解。2000年商店增加到了15家,基本满足当地的需求,供需逐渐平衡。2010年商店增加到了20家,供大于求现象迅速呈现。市场转型如何影响到买卖双方微观赊欠行为呢?

1. “支配型”赊欠:卖方市场下的赊欠图景

在“卖方市场”阶段,商店赊欠比例较少。这是宏观市场环境制约的结果。由于总供给有限,化肥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据店主介绍,1990年前,由于只有ZX镇供销社销售肥料,顾客需要排队购买,供销社新货一到就被哄抢一空。90年代中期前,虽然个体商店兴起,但是肥料的匮乏性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短缺经济学”研究专家科尔内指出,交换关系不仅是物的所有权的交换,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而短缺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7]。资源的稀缺性赋予资源占有者以绝对的权力,

卖方在与买方的力量博弈中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卖方市场下,店主对交易对象有较大的选择权,他们一般优先选择现金交易,以便尽快回笼资金,避免赊欠的风险。通过这一筛选机制,相当部分客户的赊欠要求会被拒绝,这批顾客转而通过借钱等形式购物,一部分潜在赊欠转化为借贷等其他融资行为。这一时期,有限的赊欠发生于店主的亲戚、朋友、熟人等“强关系”客户身上,能赊欠的都是“有关系的”。

“那时候就一家个体卖肥料的,还经常没货……很多人买不到肥料。商店会有一些赊欠,主要是店主的亲戚、老顾客、朋友赊的。”(店主/2009.7.30)

在卖方市场下,赊欠的内部权力结构表现为由店主占主导的“支配型”赊欠,即店主最终裁决是否准许赊欠、赊欠金额大小等。经济场域是由卖方主宰的,赊欠表现出单方的决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前顾客的赊欠基本上都是由于资金匮乏引起的“匮乏赊欠”。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农业。传统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特点造成了资金匮乏的高频率:1)先投入后产出。产出与投入具有时间差,一般为农作物生长期,约5个月。需要投入种子、农药、化肥等,以及相关的灌溉、收割、犁耙田等费用。2)收入时间的固定性。农业生产的另一大特点是收入时间的固定性,当地6、7月份与10、11月份是出售农作物的主要时间段,也是农民获取现金的主要时间段。

2. “共谋型”赊欠:买方市场下的赊欠图景

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大规模的打工经济开始出现,以及国家的农业税减免、“粮补”的发放,农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改善。ZX镇所在的长丰县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460元,2005年增长到2565元,2010年更是达到6120元。^③

令人诧异的是,赊欠消费的数量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而相应地急剧下降,绿园商店每年仍有大量的赊欠发生。店主表示,“现在两三千元的肥料钱,谁家拿不出?”有能力付款但是还采取赊欠消费的方式,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实际上这与农村市场转型关系密切。2000年以后,当地肥料市场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买方市场的特点逐渐显现:低位价值与低位价格、过剩的供给和不足的

需求、卖者之间的竞争^[8]。市场转型彻底扭转了买卖双方力量对比,消费者成为“上帝”。策略依赖于特殊的权力结构^[6],权力结构的转变迫使商店经营策略的转变。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商店需要想方设法拉拢客源,提高销售量。“买方市场效应”最先表现出的是“价格战”。各商店纷纷采取低价竞争,商店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商家叫苦不迭。同时,赊欠作为一种经营策略也被频繁使用。绿园商店店主概括了这一变化趋势:“早几年我们做生意是能不赊就不赊,那时候不怕东西卖不出去。现在是能赊就赊,不赊就卖不出去”。这种由“能不赊就不赊”到“能赊就赊”的经销策略的转变,虽然扩大了销售量,但是也扩大了赊欠群体的数量。在这种经营策略下,赊欠门槛大大降低,顾客被鼓励可以赊欠购物。赊欠由一种“迫不得已”的商业行为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营销策略。

赊欠经营策略产生了两种后果。其一,其他渠道融资行为受到排挤。卖方市场阶段,没有强关系的客户,赊欠难以完成,从亲戚朋友处借贷等方式成为重要融资渠道。买方市场阶段,在赊欠经营策略刺激下,“赊欠”对其他融资行为产生明显的排挤作用,借贷购物的顾客数量明显下降。其二,“非匮乏缺赊欠”群体数量激增。这是赊欠经营策略的非预期后果。“非匮乏缺赊欠”在农村地区数量甚为庞大,绿园商店这类赊欠顾客就占到全部赊欠顾客的一半以上。“非匮乏缺赊欠”顾客选择赊欠购物方式,源于自身的利益考量。由于赊欠价格与现金交易价格并没有显著差别,顾客选择赊欠交易并不需要付出额外成本,而闲置资金可以充分利用,产生收益。商店为了商品销售,也积极鼓励赊欠。可以说,买方市场下,赊欠由卖方单方支配转变为买卖双方的共谋行为(表2)。

表2 “支配型”和“共谋型”赊欠特征

	支配型赊欠	共谋型赊欠
时间跨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
赊欠原因	资金匮乏	非资金匮乏
市场环境	卖方市场,供不应求	买方市场,供大于求
赊欠方式	高价赊卖商品,提高单件商品价格,获取收益	低价赊卖商品,抢占市场份额,获取收益
场域权力结构	买方弱势,卖方强势	买方强势,卖方弱势

四、关系嵌入与赊欠运作逻辑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批评了这种“低度社会化”的解释,他的研究表明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亦然;并不像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的只有通过正式合同才能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基于交往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也会克服这个问题^[9]。作为经济行为的农村赊欠与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

1. 熟人赊欠与陌生人赊欠

绿园商店的赊欠按照顾客与店主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熟人赊欠,即发生于店主和熟人客户之间的赊欠;另一种是陌生人赊欠,即店主与陌生客户之间的赊欠。

由于处于农村市场中,熟人客户交易占到商店总销售额的70%~80%,而熟人赊欠占赊欠总数的90%以上。商店的“熟人客户”根据形成特征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先赋性关系的客户,即店主与亲戚、邻里关系等基于亲缘、地缘而形成的关系;另一种是获致性关系客户,即通过频繁的互动建立的关系群体,主要是一些老客户。店主评判赊欠的标准如下:一是信誉。正如布迪厄所言,信誉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在市场上很有作用^[10],信誉是店主决定赊欠与否的首要标准。先赋性关系群体由于较为熟悉,店主对其信誉信息了如指掌。获致性关系群体交往密切,以往的互动经验是重要参考。二是经济能力。欠款人的经济能力是店主考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虽然有些客户信誉较好,但被拒绝赊欠的现象也曾发生。

陌生人赊欠占商店赊欠总数的10%。由于信息的不透明,身份、信誉、经济能力等重要信息无从知晓。在绝大多数交易中,买方和卖方这两个概念

倾向于融入中间人和担保人网络,这些中间人和担保人的目标是把供求之间的纯经济关系转化成一种在系谱上成立的和有保证的关系^[10]。担保人以一种“牵线搭桥”者的身份出现,类似于民间借贷中的“中人”。担保人需要与双方都熟悉,愿意担保,信誉较好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格兰诺维特指出:“行为和制度是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的,把他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是极大的错误,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是‘镶嵌’在一起的。”^[9] 马克思·韦伯认为经济行动者在进行经济行为时,必须将他的经济行动指向其他经济行动者,同时还要指向法律秩序。同时,韦伯区分了两种契约关系:初民社会的“身份契约”和较发达社会的“目的契约”。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契约社会”里,目的契约逐渐取代身份契约^[11]。韦伯意义上的“身份契约”其实质是与人际信任相类似的,是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关系。由熟人赊欠和陌生人赊欠的方式可以看出,身份契约在赊欠中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赊欠中的“身份契约”正是产生于农村熟人社会,蕴涵于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见,社会关系和赊欠在农村市场的实践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性。

2. 关系信任与赊欠运作

如果仅仅将影响商店赊欠运作的社会关系从熟悉和陌生两个维度阐述,未免有简单化之嫌。实际上,现实中赊欠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客户与店主关系按照远近程度,总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四类:1)核心客户,主要是亲戚、朋友、邻里关系等;2)熟人客户,主要是一些获致性关系的老客户;3)半熟人客户,介于熟人客户和陌生客户之间;4)陌生客户,客户与店主不认识(图1)。阎云翔将私人关系网依据关系的远近分为核心区域、可靠区域和有效区域^[12]。就店主与顾客的关系而言,核心客户属于私人关系的核心区域,熟人客户属于可靠区域,半熟人客户属于有效区域。当然,图中用虚线表示的每个区域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各区域本质上是连续的整体。同时,区域之间也具有流动性,属于边缘区域的客户通过持续性的交往和互动,会逐渐向核心区域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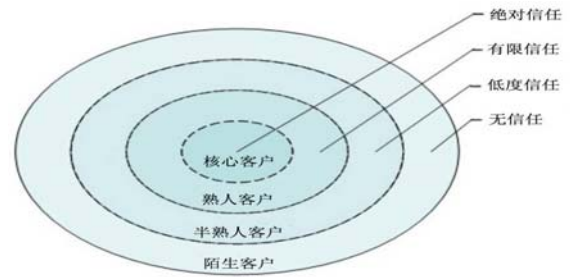


图1 绿园商店关系圈与信任示意图

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而言,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13]。如图所示,客户与店主的关系也呈现差序格局,关系的差序格局会导致信任的差序性^[14]。关系越紧密,信任度则愈高。反之,信任度则愈低。这种信任的差序格局作用于商店的赊欠交易,并且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运作逻辑。

店主对不同关系的顾客采取差别对待的办法。处于信任最中心层次的“核心客户”得到了绝对信任,赊欠的条件最为宽松。这一类顾客拥有很大权力,不需要写欠条,赊欠价格也是最优惠的;处于信任次中心的“熟人客户”得到了店主有限的信任,根据其赊欠商品的价值,酌情考虑是否写欠条。店主表示“一般钱不多的,二三百以下的,基本上都是不写欠条的。要是四五百以上,一般都会要求他们写欠条”;处于信任最低层次的是一些“半熟人客户”。对于“半熟人”店主只是“面熟”或打过一两次交道,但对其信誉、经济状况等信息是不甚清楚的。店主对这一类顾客保持一种“低度信任”,在其赊欠时,除了一些百元以下价格较低的商品外,店主都要求他们写欠条,以避免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处于最外层次的“陌生客户”,店主对其是“无信任”状态,赊欠必须写欠条,且需要担保人介入。对不同关系的欠款人,店主采取“差别对待”的方式,放松对高信任客户的风险防范,对低信任客户群给以最高程度的防范措施,从而有效地降低了赊欠风险。

3. 重复赊欠与信誉再生产

绿园商店重复赊欠现象突出,大部分顾客都有过多次赊欠经历,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对于多次赊欠的客户,表面上是“赊欠—还款—赊欠”的循环,实质内部蕴含着信誉“生产—复制—再生产”的循环。作为双方初始交易的重要参考变量,信誉决定

了店主是否赊欠。而后，随着店主与欠款人之间的交易次数的不断增加，信誉不断地进行再生产。每一次欠款人的表现可以作为下一次店主决定是否赊欠的参考标准，信誉在不断地进行复制。看似赊欠—还款—再赊欠的循环，实质是信誉的生产—复制—再生产的螺旋上升过程(图2)。随着信誉的这一累进过程，店主—欠款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断得到加强。而一次次赊欠可以看作一个个“过滤器”，欠款人如果在任一环节出现有损于其信誉的行为，如抵赖、恶意拖欠等，店主就会拒绝欠款人的下一次赊欠行为，将信誉差的欠款人过滤掉，从而使这一循环终止。而保留下来的，都是信誉良好的客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交易次数越多，双方关系越稳定，赊欠行为也越能维持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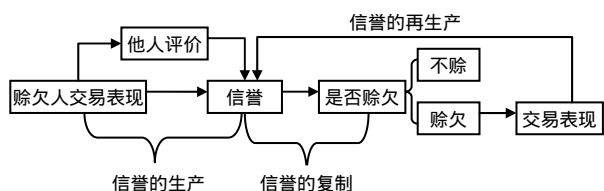


图2 重复赊欠中信誉的生产—复制—再生产图

在彼此熟悉的社会关系中，人际约束是主要的维持信任机制。这种环境下的高信任程度与下列几个因素有关：了解交易伙伴，重复交易的概率很高；交往的非单一性^[15]。在笔者所描述的这条赊欠循环链中，店主正是通过信誉了解交易伙伴，并且通过这种“赊欠—还款—赊欠”的循环的重复交易，不断地修正、检验欠款人的信誉。同时，面对相对高昂的违约成本，理性的欠款人也不会牺牲未来交易的前提下，进行欺骗活动。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这种高信任程度以及赊欠可以重复不断的原因了。

五、赊欠文化与赊欠风行

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最早可以追溯到韦伯的研究。他指出以“禁欲主义”、“天职观”为代表的“新教伦理”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及其所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恪尽职守、勤俭守时等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兴起^[16]。当代经济社会学家 Zelizer、DiMaggio 认为解释经济的分析方法中应该包括“文化元素”(cultural component)，

DiMaggio 进一步指出文化可以是“建构性”(constitutive)的，如各种范畴、书写物以及表征性的概念，也可以是“规范性”(regulative)的，比如各种规范、价值观和惯例等^[5]。透过对文化的研究，可以解读赊欠现象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

笔者将地域性的关于赊欠的亚文化称为“赊欠文化”，包括一组对赊欠的价值评判、看法等观念的集合。对赊欠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从笔者下面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到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

“前天晚上和小妹吵的很厉害，缘起于几个梨瓜。最近我们手头的钱都用完了，所以我到小区的商店里赊欠了四个梨瓜。小妹不认同我这样做，认为赊欠对我们是一种耻辱。

我的理由是，赊欠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行为，因为我有足够的信用归还，否则商店的老板也不会爽快地答应我延迟付账……

但小妹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有辱人格和形象。为什么小妹会觉得赊欠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呢？……赊欠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词，在某种程度上，指代的是匮乏和贫穷……”^④

如上文所示，一种观念认为赊欠具有耻辱性。赊欠在某种程度上是贫穷的象征。贫穷会被认为是个人能力的不足或是懒惰，被认为是在经济竞争中失败的一方，甚至有人认为“贫穷是最大的耻辱”。同时，贫穷者自身也具有某种“贫困心理”，表现为耻辱感和自卑感。在“匮乏赊欠”者身上明显体现了这种“贫困心理”。另一种观念是去耻辱感的赊欠文化。赊欠是农民在经济困难时采用的融资途径，合情合理，与借贷、典当类似，是一种应急的手段，只要能够准时还款，就无可厚非。

实地调查中很多商店客户表示赊欠在当地已经成为“风气”。透过对“赊欠风气”的考察可以深入窥探当地的“赊欠文化”。社会风气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影响下自发形成的，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趋近的思想意识、道德价值、行为意向、行为方式等，集中体现人们相近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17]。通过对绿园商店赊欠顾客的访谈，笔者认为“赊欠风气”体现的当地人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如下：其一，赊欠是“合情合理”的，赊欠被“去耻辱化”。很多人表示赊欠是一种正常现象，没有什么丢人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赊欠经历，赊欠顾客也是数

量极为庞大的群体。其二, 赊欠是“善举”。商店赊欠经营策略导致“非匮乏赊欠”数量激增, 赊欠的“贫困象征”涵义逐渐降低。相反, 很多顾客认为赊欠是在“行善举”, 甚至有顾客表示“不赊, 商店东西怎么卖掉呢”。第三, 赊欠体现某种“象征资本”。在当地, 有些顾客身无分文就可以购得商品, 这使得他们引以为豪, 甚至以赊欠作为炫耀的方式。能赊到说明赊欠人“面子大, 声誉好, 店主信任”。这种赊欠体现的象征资本成为某种可以攀比的物质, 嵌入到赊欠文化中。

当前我国农民行为受传统的、革命的、现代的三种因素共同影响^[18]。“赊欠文化”的形成既受到传统的影响也与现代因素关系密切, 是“传统性”和“现代性”叠加的产物。就“传统性”而言, 赊欠在农村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历史上, 赊欠的产生与农业生产、农民收入方式有关, 甚至是农村高利贷的一种变异形式^[19]。布迪厄指出经济场域中的个体行动者带有他们各自的“经济惯习”或者称为“经济先见”(economic predispositions), 这使得他们未来的行动与他们过去的经验联系在一起^[5]。可以说, 农民的赊欠行为受“赊欠惯习”^[20]影响深远。同时, “赊欠文化”的形成也与农村市场转型密切相关。我国农村市场产品供给逐渐由“匮乏”走向“丰裕”, 市场也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市场转型迫使农村商店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他们积极运用赊欠经营策略, 对“赊欠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六、总体社会事实下的农村赊欠

现代社会科学为了追求研究的深刻性, 通常采取“片面的深刻”的研究方法, 以局部的、割裂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但是这种方法是丧失整体性、全面性为前提的。马塞尔·莫斯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通过对“古式社会”中馈赠、夸富宴等经济现象的研究后发现, “交换—礼物”经济根本不能纳入功利主义经济的框架。莫斯进而提出了“总体的社会事实(total fact)”的研究方法: “只有通盘考虑整体, 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相, 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那一生动瞬间”^[21]。无独有偶, 为了反对传统史学

割裂自然和社会现象, 割裂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法国史学研究的年鉴学派提倡“全面的历史”的研究方法: 把个别事件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考察理解, 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22]。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时间划分方法, 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22]。

本文以“嵌入”(embeddedness)概念阐释农村赊欠现象的形成背景正是遵循“总体社会事实”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笔者寄希望于通过全面的、整体的面貌阐释赊欠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体系。“嵌入”概念的提出者波兰尼对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 他指出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的建构。他把市场看作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 而广阔的经济是更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23]。同样, 农村赊欠是农村经济的一部分, 更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农村赊欠是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化背景之中的, 并且有着不同于民间金融和信贷的产生背景和行为逻辑。正是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农村文化特点衍生了规模巨大的赊欠现象, 赊欠在农村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与经济学视角相比, 笔者认为赊欠现象的盛行并不完全是农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的反映, 实际上绝大部分赊欠是风险可控、烂账极少的交易。赊欠是农村社会中的市场转型、关系运作以及农民“赊欠文化”的反映。另外, 与现代金融制度及其信用体系不同, 赊欠背后蕴含的熟人信任机制在农村地区具有多重优势^[24], 如可接受性强、信息透明、操作简单、方便灵活等, 可以广泛用于小额贷款等领域, 从而弥补现代金融在乡土社会的水土不服。

注 释:

- ① 感谢导师陈阿江教授的悉心指导, 文责自负。
- ② 与此相关的三个文件是: 1988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 1998年11月16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化肥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2009年8月24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化肥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 ③ 数据来源: 《安徽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资料。
- ④ 《一件烦心事》, 佚名. <http://seo.woku.com/html/article/2007/05/30/336/chz1/1392469.html>.

参考文献:

- [1] 李金铮. 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33-134.
- [2] 鲍盛华, 齐海山. 小卖店为啥成了“小赊店”[N]. 人民日报, 2002-04-19(9).
- [3] 简斯·贝克尔特. 经济社会学与嵌入性[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6): 85-95.
- [4]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 481-510.
- [5] 斯梅尔瑟, 斯威德伯格. 经济社会学导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19-23.
- [6] 布迪厄. 经济人类学原理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89-94.
- [7] 亚诺什·科尔内. 短缺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12-85.
- [8] 卢莉. 买方市场制度浅析[J]. *经济问题*, 2001(3): 10-12.
- [9] 格兰诺维特. 镶嵌[M]. 罗家德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28.
- [10] 布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82-188.
- [11]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M]. 何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15-137.
- [12]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M]. 李放春, 刘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96.
- [13]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6.
- [14] 童志峰. 信任的差序格局: 对乡村社会人际信任的一种解释[J]. *甘肃理论学刊*, 2006(3): 59-63.
- [15] 张静. 信任问题[J]. *社会学研究*, 1997(3): 84-87.
- [16]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等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 [17] 刘超良, 杜时忠. 社会风气: 在制度德性的变革中转变[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4): 20-24.
- [18] Liu Xin. *In One's Own Shadow*[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5-30.
- [19] 陈铮, 宋永忠. 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的特点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3): 151-156.
- [20] 耿言虎, 汲怀远. 赊欠现象的非经济因素阐释[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28-30.
- [21] 马塞尔·莫斯. 礼物[M]. 汲喆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03-205.
- [22] 费尔南·布罗代尔.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 顾良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2: 3-7.
- [23]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刚, 刘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20.
- [24] 耿言虎. 商店赊欠经营模式的信任机制研究——S商店个案研究[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100-104.

责任编辑: 陈向科